

· 专家论坛 ·

管仲学术思想对《黄帝内经》中医药理论的影响

张登本*

摘 要 《管子》详实而质朴地记载了管仲的治国理念和具体实施措施,涉及阴阳五行观念、十月太阳历法、重土重水思想等,还用较高的思维视角,对气、精、精气、道等范畴进行论述,将养生纳入国策之中。这些中华传统民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理念,深刻影响着《黄帝内经》对中医药理论的建构。

关键词 管仲;《黄帝内经》;中医理论

管仲(约公元前 723 年—公元前 645 年),姬姓,管氏,名夷吾,字仲,谥敬,世人尊称为“管子”。管仲是先秦第一子,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,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,被誉为“华夏第一名相”。《管子》是由战国中期的学者对管仲制定的治国理政文件整理而成的^[1],共 86 篇重要文献,尽管着实地通论治国方略,字里行间却透露着阴阳、五行、精气、道论、养生以及“重土”“重水”理念,成为《黄帝内经》构建中医药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文化源头。

1 管仲将阴阳观念上升到哲学层面之意义

阴阳概念源于古人在长期生产、生活中“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(《易传·系辞下》)的取象思维^[2]。阴阳概念的初义是人们对太阳活动及其产生的向光、背光,温热、寒凉,晴天、阴天等自然现象长期的观察和体验,在“远取诸物”取象思维下产生和抽象的^[3]。成书于西周的《易经》并无“阴阳”一词,书中运用阳爻和阴爻符号表示阴阳并以此演绎为 384 爻辞,后来将阴阳抽象为两种物质及其势力,解释诸如地震之类的自然现象(《国语·周语》)^[4]。这一时期是阴阳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,认为阴阳是形成宇宙万物的“大气”分化后而产生的阴气和阳气,并以此解释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变化规律。管仲是较早将先秦早期的阴阳观念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贡献者之一。其用阴阳对立、互根、互用、转化关系解释四时气候的寒暑变迁,解释一年四季昼夜的长短变化,故《管子·四时》有“阴阳者,天地之大理也;四时者,阴阳之大经也”之说,《管子·乘

马》有“春夏秋冬,阴阳之更移也;时之长短,阴阳之利用也;日夜之易,阴阳之变化也”之论,认为阴阳变化是自然界有节律运动变化的根本原理与法则。这也是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之“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,万物之纲纪,变化之父母”中“阴阳”定义的文化源头之一。

2 管仲基于十月太阳历法将一年分五季而论五行

五行源于古人在长期生产、生活过程中,对人类生命活动影响最大而又最为直接的十月太阳历法的五季观念。就五季、五方的时、空区位而言,人类第一次将自己生存的时、空区位放在有规则、有意义、可认知的时、空系统之中,由此形成了古人将可以认识的事物进行五季、五方分类配位的观念。

在十月太阳历法的背景下,管仲为五行知识步入哲学领域作出了相应贡献。在《管子·五行》的“甲子木行……七十二日而毕”“丙子火行……七十二日而毕”“戊子土行……七十二日而毕”“庚子金行……七十二日而毕”“壬子水行……七十二日而毕”之论中,“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”是十月太阳历法五季中每季第一个月的月干;“子”为首月的夜半子时,即每季的首月首日的起始时辰。此节原文昭示学界:①《管子》是先秦集中、明确表达十月太阳历法的重要文献,并明确表达天干纪月的事实;②明确表达了该历法每季“七十二日”的特征;③表达了五行是基于十月太阳历法一年分五季观念的“概念”而界定的,表现为“天-地-物-人”三位一体互联互通、有序变化的五种“象态”;④明确了每年五季以“木行→火行→土行→金行→水行”相生为序。十月太阳历法,是《黄帝内经》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应用的重要历法之一,大凡经文中涉及五行观念、一年分为五季、每季(或每脏应时)各

* 作者简介 张登本,男,教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,全国“五运六气理论”博士后流动站兼职博士指导教师,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会顾问。

• 作者单位 陕西中医药大学(陕西 西安 712046)

主“七十二日”的内容,都有该历法的印记^[5]。《素问·阴阳类论》中“春甲乙青,中主肝,治七十二日,是脉之主时”之论,无不与此处所论十月太阳历法有关,无不与《管子》中有关五行的内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3 管仲首次提出“土者,万物之本原”,开创“重土”文化理念

《管子·水地》首次提出“地(即‘土’)者,万物之本原,诸生之根菀(通‘源’)也”的观点,直接影响着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中“脾者,土也……生万物而法天地,故上下至头足,不得主时”这一理论之“中土五行思维模型”的构建^[6];同时也是《素问·平人氣象论》中“胃者,五脏之本”“人以水谷为本,故人绝水谷则死,脉无胃气亦死”论证脉有胃气发生的哲学基础。基于管仲率先提出的“土者,万物之本原”之观念,《黄帝内经》162篇原文中唯有脾胃理论作为篇名而予以两次专论(《素问》的《太阴阳明论》和《阳明脉解》),其他脏腑则无。这一“重土”观念还体现于《灵枢·本神》记载的五脏病机内容中,唯在论述脾、肾病机时有“五脏不安”之说,此为后世医家重视脾胃提供了理论依据,李杲的重脾理论、李中梓之《医宗必读》“后天之本在脾”等立论之根源莫不受此影响。

4 管仲基于“重水”思想,率先提出“水者何也?万物之本原也”

《管子·水地》首次提出的“水者何也?万物之本原也”“人,水也”之论,影响着《黄帝内经》对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。此理论既是《素问·逆调论》提出“肾者水脏,主津液”,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将津液这种维持人体生命机能最主要的精微物质称为“水”“精”或“水精”并认为其由肾所主的缘由;也是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将主管人类繁衍后代、具有生殖机能的器官皆归之于肾的文化之源。当然,中医药相关理论的形成不仅仅限于文化背景之一端,而是有其复杂、多样的因素。《黄帝内经》总结了当时多方面的相关知识,以肾及膀胱、溺孔、茎垂等结构的解剖关系的发现为事实依据,结合“近取诸身”的排尿、生殖活动的切身体验,确立了“肾合膀胱”对水液代谢的调控,以及从“茎垂”之端“溺孔”泄注之精(《灵枢·刺节真邪》)能延续生命、繁衍后代等理论,于是在《管子·水地》中“水生万物”“精气为人”的哲学观念参与下,形成了“肾主水”“肾为水脏”“肾藏精”及肾主生殖的理论,并以此为基础,形成了“肾藏象”的理论^[7]。

5 管仲从较高的思维视角给予“精气”概念深刻的内涵

《管子》多篇论及“精”“气”及“精气”,且以《管子·内业》最为突出。《管子·内业》曰:“凡人之生也,天出其精,地出其形,合此以为人。”又曰:“凡物之精,此则为生。下生五谷,上为列星……藏于胸中,谓之圣人。是故民气,杲乎如登于天,杳乎如入于渊,淖乎如在于海,卒乎如在于己。是故此气也,不可止以力,而可安以德;不可呼以声,而可迎以音。”认为天地之间被精气所充斥,无论是太空的“列星”,还是地表生长的“五谷”,甚至人类,皆由精气所化生,即使是人体的目之视、耳之听、舌之味等器官之功能,也是脏腑精气作用的结果。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之“人以天地之气生”,及《灵枢·脉度》之“肝气通于目,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……肾气通于耳,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”等学术立场,与此如出一辙。

《管子·内业》言:“精也者,气之精者也。”这是最早有关“精”源于“气”而又有所区别的论述,正因为如此,《管子》多次使用“精气”概念。这应当是《黄帝内经》中2952次论“气”、217次论“精”、38次论“精气”与之文化同源、同宗的具体印记,也应当是中医药学理论中精气理论发生和应用的重要史料。

6 管仲论“道”,酣畅淋漓,质朴无华

《管子》是先秦时期论“道”的重要文献之一,认为“道也者,口之所不能言也,目之所不能视也,耳之所不能听也……凡道……万物以生,万物以成,命之曰道”(《管子·内业》)。这就给予“道”的内涵以近乎直白、通俗、简捷、酣畅、质朴的表述,指出“道”虽然是人类感官无法感知的,但又是无处不在的,是天地万物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或规律。

道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,也是《黄帝内经》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的重要哲学理念,其中269次论“道”虽有多种意涵,但其中最主要者,莫过于以“道”表达“方法、法则、规律、理论”等义项^[8]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中“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,万物之纲纪,变化之父母,生杀之本始”之论与管仲对“道”的理解一脉相承,由此也可以看出管仲论“道”的学术立场对《黄帝内经》构建中医药学知识体系的深刻影响。

7 管仲提出“养生”理念,并纳入治国方略

管仲在《管子·白心》中较早地提出了“养生”概
(下转第11页)